

# 钱钟书《人·兽·鬼》新论

□关 峰 [长安大学 西安 710064]

**[摘 要]** 钱钟书把肇自“五四”的知识分子的普世救赎意识特别翻转了过来,由此批判了病态的中国社会。在他笔下,所谓“爱”的世界毋宁说是一个幻梦,战争倒才是这世界的本性,甚至是日常生活本身。《人·兽·鬼》虽是集内小说内容的排列,同时却也在类比的关系上暗示出他对于人性的解读。钱钟书的寂寞书写是现代中国文学这一特性的极具意义的部分,同时也是最为日常的阶段。他洞悉人生严酷、冷峻的一面,故而一再展览、抉食世相,并在文本张力的隙缝扣触无边的孤寂。

**[关键词]** 知识分子; 战争; 孤寂

**[中图分类号]** G3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1)05-0077-05

文学是“人”学,尤其是小说,不过,同是写“人”,古代文学偏于“向上性”,或“状元及第”,或“妻妾圆满”,或兼而有之。一句话,人间的美妙非众人仰望不能企及,不由得人不艳慕。相反,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却戛戛于人的“向下性”:身系社会,无论如何挣扎、反叛,终究摆脱不了凄惨、冷酷的命运,世间所谓现代悲剧性。郁达夫、张爱玲于此各有创获,钱钟书小说集《人·兽·鬼》则别现神采,至今不衰。

## 一

萨义德曾划分知识分子为“诺诺之人(yea-sayers)”和“谔谔之人(nay-sayers)”两类。与前者不同,“谔谔之人(nay-sayers)”乃“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sup>[1]16-17, 25, 48</sup>萨氏特别提及“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以示反传统品格,而在钱钟书笔下,知识分子却变身为丑类,和“兽”、“鬼”无异了。

与沈从文《八骏图》的反讽相比,《猫》的写实色彩浓了些。小说赞许似的笔致全抵不上事实的描

摹,猫终于只是破坏性的动物,于世无补,那些随喜俯仰的知识分子们则像猫一样,全为沙龙的摆设,最多做些人生的装饰罢了。钱钟书把承自“五四”的知识分子的普世救赎意识特别翻转了过来,由此批判了病态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本为社会的急先锋,负有引领民众的重任,时时出没作呐喊的督责,以警觉歧路的蛊惑,但在《猫》的世界里,那些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名流们早已倒伏在雌性的暗流里,男女艳事成了争锋的场景,惟此,甚至政治也沦为附庸,“情感动物”之谥一点也不过分。

肇自新文化运动的鲁迅和郁达夫笔下的知识分子最是接近原型,这些人担负着巨大的历史和现实的压力,因而内心也变得格外强大,但在急切的时代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始终处于敌对而焦躁的状态,无法达成和解,遂并衍就孤寂的心理能量,以对抗外在的异己势力,如“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魏连殳(鲁迅《孤独者》),“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零余者(郁达夫《零余者》)。随着政治力量整合的明晰化,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逐渐强化,即是中间立场的读书人也尝试掠去“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雾霭,而转入看不见硝烟的阵地,犹如行伍出身的沈从文明白宣告“严肃”的“道德的努力”的大司务似的诚实态度,而非“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玩票白相神气的海派作风<sup>[2]</sup>,孤寂的悼叹渐为激扬的征伐所取代。

《猫》就是这样背景的产物,小说中马用中、袁友春、陆伯麟、赵玉山、曹世昌、傅聚卿、郑须溪、陈侠君,以至李建侯、爱默诸人仿佛其时所在的北平,表面上不脱文明中心,“似乎包含着元明清三朝帝国的劫灰”,其实却是“无用过时的东西”,借用袁友春的绍述是再恰当不过了,“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拳的‘扶清灭洋’,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他最近发表了许多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是中国人的特质。”钱钟书曾在自序中告白“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过这里显有所指,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钱氏的批判意向。这样的沙龙景观有年轻人恋爱的形式和动机,却没有那里的神圣,先是谈话的收束就不怎么正大,充斥着“丧气”、“无耻”等字眼,继之而来的结果是这茶会主人的争吵与分裂,事实来了一个莫大的嘲讽。鲁迅曾指出,“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sup>[3]190</sup>如果说艺术是情绪的体操的话,那么《猫》中的知识分子最多只在演绎头脑的舞会罢了,如陈侠君“我是懦夫”的招供那样,他们无力直面现实,却又不得不顾及生存,故而“自由”大打折扣,沦为自炫自鬻的工具罢了。

《猫》里知识分子的丑相毕竟有所遮盖,《灵感》则直捷多了,小说中的“作家”“声名太响了,震得我们听不清他的名字”,“只要提起‘作家’两字,那就是他。”钱钟书择取这一形象,意在树立知识阶级最高批判的靶子,压根儿不曾给予同情甚至哪怕一点理解。先因落选诺贝尔奖而一命呜呼,继之笔下各色人物的索命,最是“作家”对于“地府胡子”的表白:“你以为现代的天才还是潦倒穷酸不善理财的梦想者,一头长发、一屁股债吗?你还中着浪漫主义的余毒,全没有认识现实生活呢!我们不是笨人,了解经济在生活里的重要,还怕自己不够精明,所以雇佣了经纪人和律师来保障文明的利益。”知识分子不只丧失了监督与导引的神圣职责,甚而远离了血性自我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乃至为现实生活所整合,把“崇实”的作风演变为彻骨的工业资本主义行为,谈何拯救灵魂、改造国民性的事务呢?相反,倒是造成不少冤魂,荼毒了不少生灵,而这些不白之冤是直到地府也才能清算的,怪不得“胡子”不止一次申述“地域迁往人间”的道理,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能够得享高名的“作家”是怎样的恬不知耻了,以至想望“可以占有随时随

意恢复处女状态的美人,空中成群飞着脆皮的烤鹅和烤鸭”的天堂,或是跌坐到“不成功的人到那里可以成功,成功的人到那里可以收获”的美国。这一类的民族怎能经受得住现代世界风雨的侵袭,难怪国家要蒙受战争的威胁和重创了。

## 二

战争是人类最残酷、最野蛮的现实,而在钱钟书笔下,所谓“爱”的世界,倒永远是一个幻梦,战争才是这世界的本性,以至日常生活本身。知识分子的沙龙上所谈论的战事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像是普通事情的可能性一样。科学家郑须溪甚至宣称:“从超政治的观点来讲,战争也许正是我们民族胜利的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可以刺激起我们这个民族潜伏着的美德,帮我们恢复精神的健康和国家的自尊心。”“人生原是这样,从丑和恶里提炼出美和善。”尽管即刻遭到李太太的抗辩,以为“为战争找道理,并不能抬高战争,反而褻渎了道理”,不过,李太太的主人身份尽管不得不出面圆场的因由,达成“众人”的和解,其实已然无力多了,而在结构上倒不失为一抹很好的过渡。总之,战争的主控地位并没有动摇,这只要看陈侠君的讲说就可明瞭:“在这种委曲苟安的空气里,我们一天天增进亡国顺民的程度”,因而他主张“打”,虽然自承“懦夫”,不肯、不能也不敢上前线。陈侠君的态度透出国难知识界的空气,某种意义上也道出了求新奇、刺激的人性诉求。

《纪念》即在战争与刺激间建立了协作关系,小说中的人物未尝不愿战争的结束,但正是战争,使得他们原本平凡的生活更加平淡起来,战争制造了新奇,同时也制造了荒芜。有意思的是,钱钟书特别予以性别的书写。两个男人天健和才叔总有许多事情要做,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征战的精神舞台,即使像才叔这样“只会安着本分,去磨办公室里比花岗石更耐久的台角”的“孩子”,也很少能够在家,来陪伴“气闷”的妻子,更不要说“善于交际”的天健了,而作为女人的曼倩则要独自承受无聊而长久的日子的煎熬,以至与雇佣的老妈子也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战争异化了人性,而个人也在战争面前难以整合起自身,最终陷入分裂之中。曼倩和天健不必说了,他们彼此牵恋,清醒地意识到身处矛盾之中的二重格局,即是丈夫才叔,也未能逃脱得开。局外人冷眼觑视他的境地,非“同情”的态度所堪,而这一切的原因都不能不追溯到战争。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不是战争时期所特有的,但在战争

的环境下,这样的情形就并非“偶然”的了。无论如何,战争搞乱了一切,不仅炸毁了房屋,褫夺了人的生命,甚而颠覆了人伦关系,民众期盼战争早日结束,实际上是对于人类秩序和尊严的呐喊与憧憬。

面对战争,人之不安弥漫开来,不只失去了历来的圆稳,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分化,斗智斗勇的心计之争一点也不比战争本身逊色,《上帝的梦》就揭示了这一现实。小说采用了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借上帝的梦境展现了人类关系的基本形式。世界上即使仅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难以造成和平共处的局面,为着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终要引来事端,以满足一己的私欲,而更大的讽刺是,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的上帝也并非真的慈悲,救世主同样有“文明人”的思想,“要一个伴侣来解闷儿”,而造成的伴侣,却不能引来惬意,“造了这一对男女,反把自己的寂寞增加了;衬着他们的亲密,自己愈觉被排斥的孤独。”于是上帝也加入到战争的行列中来,直至男人、女人因此而毙命,而人与动物间的争斗就更不必说了。总之,世界就是一个大斗技场,人与人之间混杂着攻与守的伎俩,如此人际图式正是其时社会关系的反映,连年的战争早把人逼近了生存和毁灭的边缘,一方面异常敏感,外面世界极易于人心上掀起波澜,一方面却又那么粗糙、呆钝,战争似乎统治了国人的心理,一切都被战争化了,《上帝的梦》中男人和女人最终因相互间的“敌对”而死掉,而亲手缔造他们的上帝非但没有收获“冷战”所带来的幸福,反而愈益孤独,“上帝伸着懒腰,对这死气沉沉的落日,生意奄奄的世界,长长地打个厌倦的呵欠,张大了嘴,好像要一口吞却那无穷尽、难消遣的光阴。”如此结尾既是对另外一种真实的梦境的呼应,同时也是对于人及其世界的洞察,如果没有类似战争的冲突,世界与人类都将因萎靡而消亡,而战争与人类都将因对方而生动起来。

钱钟书惯以反讽写人,《人·兽·鬼》虽是集内小说内容的排列,同时却也在类比的关系上暗示出他对人性的解读。人的面相一旦揭破,兽和鬼相对显露无遗,而这样的过程就像战争一样,先是敌对,继而火拼,最终攻陷,如《猫》中的李建侯和爱默夫妇,因为社交场合上的热情与冷漠,他们变得不那么和谐了,而私人书记齐颐谷的介入,更加重了那节拍,两人发生了争吵,最终因情人的出现而陷于崩溃的边缘,李太太“忽然觉得老了,仿佛身体要塌下来似的衰老,风头、地位和排场都像一副副重担,自己疲乏得再挑不起。她只愿有个逃避的地

方,在那里她可以忘掉骄傲,不必见现在这些朋友,不必打扮,不必铺张,不必为任何人长得美丽,看得年轻。”李建侯则“心境像向后飞退的黄土那样的干枯憔悴”,“自悔一时糊涂,忍不住气,自掘了这个陷阱。”由此,钱氏辛辣地嘲讽了乖张而无聊的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纪念》同样写了这样的过程,因了平庸生活的反抗而生出的婚外情一开始并不美好,曼倩甚至冷淡、讨厌,不过,敏感的心加以热烈的情,当一切都奔凑到一起时,她和天健也走到了一起,“她只希望跟天健有一种细腻、隐约、柔弱的情感关系,点缀满了曲折,充满了猜测,不落言诠,不着痕迹,只用触须轻迅地拂探彼此的灵魂。对于曼倩般的女人,这是最有趣的消遣”,而天健却是“直捷”的“结实,平凡的肉体恋爱”,两相碰撞,其结果也如战争一样,天健“获得惨酷的平静”,而曼倩则每每“不由自主地寒栗,似乎身体上沾染着一部分死亡,又似乎一部分身体给天健带走了,一同死去。”两人超越社会的情感战争终以双方的失败而告终。

### 三

也许是人世间这样那样制限的缘故,文学作品中的孤寂体验总是来得那么深切,而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战争与贫穷并起,专制与杀戮齐备,知识人大多处于惊悚不安的态势中,那样的体验就更其鲜明了。钱钟书的孤寂书写是现代中国文学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却也是最为日常的阶段。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往往在传统、社会及革命的框架下安置人物的心灵,抗争的背后是伟大的孤寂,郁达夫、冰心等都提供了这一原型。到了三十年代,纷乱的现实凸出在世人面前,先前的家国情结不再独领风骚,《莫须有先生传》、《边城》以至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小说延展开别样的心理图景和精神的落寞。钱钟书则又有所发展,战争震撼了生命,人的存在仿佛日光下的琉璃塔,不堪重负,而且充满着腐败的秽气,《纪念》就是这样的篇什。本来在神圣的自卫战争面前,天健绝对是条响当当的汉子,事后各社会团体的追悼会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在读者的心目中却减色许多。英雄的纪念因了不道德的婚外情一变而为女主人公曼倩心绪不宁的抗拒,再变而为文本对于纪念本身的解构。战争吞噬了人的生命,同时也摧毁了伦理秩序下的家庭,小说结尾写道:“才叔懒洋洋地看着他夫人还未失去苗条轮廓的后影,眼睛里含着无限的温柔和关切。”世界就像战争一样,到处充满了破坏和分裂。曼倩

的旁逸的情感在才叔不仅仅是一个秘密,更多的则是对现实中人与人关系的图解,天健、曼倩、才叔三人的图式互有关联,但又自成体系,不为他人所解,每个人都浸没于孤寂里,无法自拔。

曼倩们或者只是《上帝的梦》中所造的男女,其幻灭自是无可厚非,但在《猫》、《灵感》中,作为精神高地象征的社会精英们却同样一塌糊涂,《猫》中的婚外情虽然没有了《纪念》的“正义”的釉彩,却是道出了生活的常态。不仅夫妻之间已然隔绝,就是为“情”而走在在一起的男女也各怀心思,则其前程也就可想而知了。《灵感》的手法更妙,那位作家之作家因了落选诺贝尔奖而气闭,生前的荣光一变而为地狱的罪恶,又逢书中人物纷至沓来、争相索命,此时的地狱和人间已全然掉了个儿,人间成为地狱,而地狱则是公正和法理的所在。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作家(作者)末了再获新生,先前的悲剧仍要重演,所谓“灵感”不过是偷情和杀生而已。本应为国民灵魂写实和重塑的精神文本不得不接受质疑与审判的尴尬,而孤寂的暗影也随之铺散开来,只不过没有《上帝的梦》那样显豁罢了。

钱钟书洞悉人生严酷、冷峻的一面,故而他一再展览伙食世相,并在文本张力的隙缝扣触无边的孤寂。《上帝的梦》借托梦境,围绕“孤独”二字写尽了现实。上帝因了孤独才率性造人,而人同样不甘于孤独,跼望无量的幸福,甚而宁愿因此违忤上帝,最终落得个灭亡的收束。钱氏指出,现实的本性就是孤寂,即使人类智慧升华的上帝也在羁限之中,逃脱不得。最后,男人、女人因孤寂丧命,上帝也因孤寂而苦苦挣扎。与此相像的还有《灵感》一篇,已然老去的“作者”的幽灵重新复生于新作者的体内——中国的将来不见得美好。映着暗黑的社会,“作家”的真相昭然若揭,钱氏的批判英气也跃然纸上。

《猫》和《纪念》更为圆通。在机智、僵硬、虚荣而又浅薄的环境里,爱默与颐谷、建侯与“表侄女”间的情感可有可无,简直可怜、可笑,甚至爱默、建侯夫妇间也未尝不是如此,浮荡的生存状态本身又何尝不是北平乃至整个中国的缩影。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熙熙攘攘、乱作一团,有希冀,也有失意。小说结尾,建侯陷入纷乱之中,与此同时,那“表侄女”的情人却“觉得人生前途正像火车走不完的路途,无限地向自己展开。”钱钟书善于在人生的起伏交错中展现孤寂的枯寞,《猫》的结尾就浓缩了建侯、爱默、颐谷和女孩子不同的情绪体

验,从而表达了悠远人生的孤寂况味。同样的笔意也出现在《纪念》的结尾,一边是心事重重的曼倩在情感与现实的冲撞中载浮载沉,一边则是浑然不觉的丈夫才叔“懒洋洋”的“温柔和关切”,如若知晓妻子婚外情的秘密,——并且是自己的表弟,——他还会如此怡然吗?钱氏着意措置的戏剧性反差既明白地反映了人的孤寂的生存状态,同时又在相反而又相成的形式上隐喻了生活某些本质的方面,所谓同其表而异其里,归根结蒂仍是对于孤寂世间的深重喟叹。面对铁屋子的鲁迅呐喊于天地,争天拒俗,甚而反抗绝望,与社会战,其孤寞非常人能知。世纪初的王国维直叹“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sup>[4]</sup>他后来的自杀未尝不是一种苦痛的孤寂,钱钟书小说则流动着浓重的失落的空气,不仅是小人物,就是那些声名显赫的社会名流甚至上帝也一样猥陋,抗战英雄的软化则再次现出真相的衰败。人人都挣扎于可叹、可悲的边缘而不自知,根本无法交融,而共同拥有乐观的未来。在国统区的环境下,钱氏小说客观上起到了颠覆腐朽政权及瞩望新中国的精神效用。

钱钟书后来曾回忆《人·兽·鬼》的时代道:“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物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本着这样的自信,钱氏无情地揭穿了鬼蜮人间的假面,甚而竟至人并不能高明于鬼,很多时候倒是“鬼”还稍觉可爱。引人深思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宝贵的“人的发现”已彻底崩坍,不光女性解放的问题备受质疑,就是现代文明的历史也濒临倾覆,这是作家面对中日战争及战后国统区现实的邃密省察。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集《人·兽·鬼》既是旧时代灭亡的沉郁的交响乐,又是新时代面影的割切的召唤书。

## 参考文献

- [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2]沈从文.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C]//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3]鲁迅.关于知识阶级[C]//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4]王国维.红楼梦评论[C]//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下转第108页)